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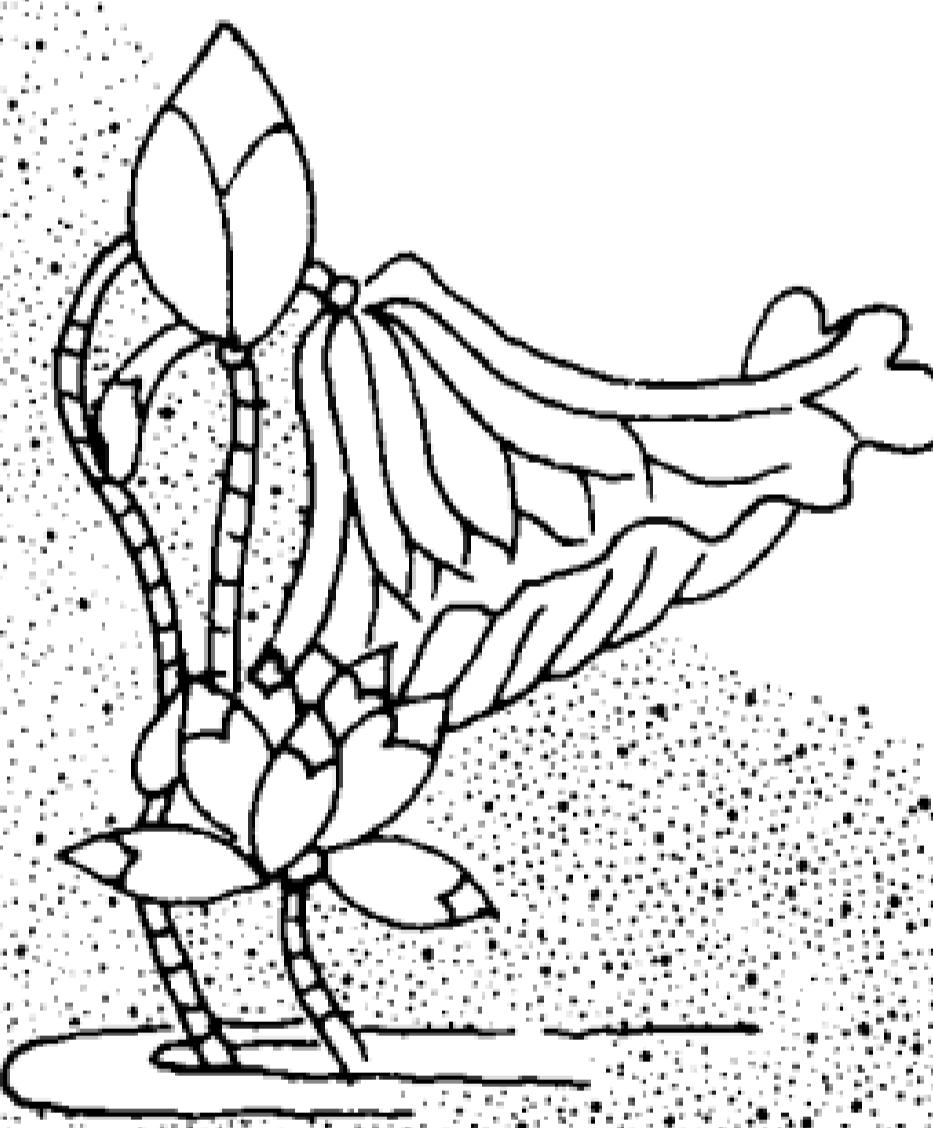
隋代佛教史述論

■藍吉富著

圖書發行

隋代佛教史述論

藍吉富 著



新人人文庫 33

隋代佛教史述論

基本定價四元六角

著作 藍吉富

責任編輯 葉樞英 曾韻華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者 余芝光 何芝

發行人 張連生

印 刷

刷 版 所 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3116118

傳真：（02）3710274

郵政劃撥：○○○○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三六號

• 一九七四年五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0778-0 (平裝)

72245

自序

一般治佛教史的學者，經常述及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歧異。然而，中國佛教決不可能是一開始就與印度佛教不同。因此，到底這兩大佛教系統何時開始分流，這是一個頗值探究的問題。

漢魏兩晉時期，佛教初入中國不久，中國佛教思想當然難以自成體系。其時自不可能侈言「中國佛教」之誕生。南北朝時期，雖然在宗教行為及義學研究上，中國僧人都有相當優良的成績。然而若說其時已有能與印度佛教相颉颃的中國佛教出現，則似仍言之過早。儘管後世學者多認為當時已有成實、涅槃、地論、攝論諸宗出現。但是這些為後世學者所稱為「宗」的佛教團體，只不過是對印度佛教經論的研習學派而已。並不能即視為能夠自立新義的中國佛教宗派。

因此，我們大體可以斷言：中國佛教的獨立，當在隋唐時期。然而，隋唐二朝有三百多年，究竟是在隋代、初唐、或中晚唐，中國佛教才正式成立，這又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由於後代所習稱的天台、三論二宗的開祖（智顥、吉藏）都可算是隋代人物。因此，筆者乃大膽假設隋代為中國佛教的

開始。爲了要求證這一假設之是否能夠成立，乃產生了撰寫本書的主要動機。

其次，南北朝時的我國佛教，由於受到政治分裂局勢的影響，乃使南北雙方的佛教發展方向，大異其趣，隋代天下一統，佛教是否也隨著政治局勢而化分爲合，以及南北佛教合流的情形如何，這也是筆者所曾關心的問題。因此，要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也是撰寫本書的另一動機。

大部分治中國佛教史的學者，往往將隋唐二代併爲一談。而且多半忽略隋代而偏重唐朝。甚至於在敍述某一佛教史實時，常從南北朝一躍到唐代，而對隋代所曾發生的歷史現象隻字不提。有些學者則將隋代佛教史實附屬在唐代部分。像這樣將隋代視之爲南北朝到唐代之過渡時期的處理態度，似乎並不公允。因爲單看文煬兩帝的佛教事業，以及名師之輩出，都可看出隋代佛教實有其足以自成單元的重要性。因此之故，企圖拈出此一時期在中國佛教史上所應得的歷史地位，也是筆者的撰寫目標之一。

本書以隋代三十七年間（五八一—六一八）的佛教問題及其相關史實爲主要範圍。所採取的態度是歷史的，而不是哲學的。所以，內容略於佛教義學而詳於佛教的外延問題。佛教義學固然相當重要，然而佛教的其他歷史問題也絕不可忽。如果只注意義學而忽略因佛教而引起的其他歷史現象，其最大的弊病，是容易使所探討的問題變成歷史上的孤起事件。而遺漏了其與其他歷史現象的相關性。

由於本書的重心，是以這種歷史觀點來看隋代佛教，所以，筆者儘可能地注意每一重要史實的前因、後果、淵源、影響，以及該一人、物、事件的歷史地位。儘量地將佛教這一歷史現象放置在與其相關的整個隋代歷史大流之中。曾任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的西方史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先生曾說：「從我們的現代觀點來看，司馬光的方法最嚴重的缺陷之一，也是幾乎所有中國傳統史家的缺陷，是將注意力局於一個時代的一項孤立事件……，可是不曾嘗試將每一事件與其他衆多事件，編織成一錯綜的關係網。」*筆者所持的撰寫態度，是希望儘可能地避免這一缺陷。

以筆者之淺學，要想達到上述諸預期之目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錯誤也必定是難免的。希望讀者們能多予指正。

本書撰寫期間（一九七二—一九七三），承業師 藍文徵教授多方導引，賜正甚多。脫稿後，又承 楊師紹震、 李師樹桐補正不少舛漏。銘感之餘，謹在此敬表最誠懇的謝意。

*據杜師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二〇頁所引。

目 錄

自 序

第一章 文、煬兩帝與佛教

第一節 文帝與佛教

一、文帝佛教信仰的背景及弘法原因

二、文帝與周末佛教的關係

三、文帝的弘法大事

四、文帝對道教儒家的態度

五、梁武、隋文二帝佛教信仰的比較

第二節 煬帝與佛教

- 一、煬帝即位前的佛教事業 27
二、煬帝即位後的佛教事業 30
三、文煬兩帝奉佛態度之比較 32
四、《佛祖統紀》中對煬帝弑父一事所作迴護之詞的討論 41

第二章 上層社會對佛教的態度及釋道二教間之關係

- 第一節 隋室諸王與政府官員的奉佛 51
一、諸王與佛教 51
二、政府官員與佛教 56
第二節 世俗學者的佛教思想 66
一、南北朝以來世俗學者的佛教議論風格 66
二、顏之推 68
三、李士謙 71
四、王通 73

第三節 繹道二教間之關係···	78
第三章 僧衆的管理、組織與寺院問題···	85
第一節 僧官、寺職與僧籍···	85
一、隋朝以前的僧官制度···	85
二、隋代的僧官···	89
三、隋代的寺職···	92
四、僧籍問題···	95
第二節 隋代佛教的特殊組織——十五衆與五衆···	99
第三節 寺院的興建···	102
一、寺額···	102
二、官立寺院的興建···	104
三、民間寺院的興建···	106
第四節 寺院的經濟基礎···	108

一、隋代寺產公有制舉例	108
二、官方對寺院的補助	110
三、民間信徒的布施	112
四、寺領產業的經營	116

第四章 隋代佛教的風尚及南北佛教偏尚的統一

第一節 隋代佛教義學之風尚及其地理分布	121
第二節 民間佛教的信仰偏尚	137
一、隋代民間的一般佛教信仰	147
二、隋代民間的特殊佛教信仰	149
第三節 南北佛教偏尚的統一	157

第五章 隋代重要僧人之歷史地位及影響

第一節 信行與三階教	157
------------	-----

一、信行其人之傳略與風格
二、信行之三階教法的根本大義
三、信行之三階教法的歷史意義
四、從三階教團的發展看信行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智者大師智顥
一、智顥一生大事及其人所顯現的特殊風格
二、智顥佛教思想之特徵與歷史地位
三、智顥與天台宗
第三節 嘉祥吉藏
一、吉藏其人之傳略及風格
二、吉藏佛學之特徵及其人之歷史地位
第四節 慧遠與彥琮
一、慧遠事蹟
二、慧遠之歷史地位的判定

200 196 196 192 188 188 182 176 173 172 170 167 160 158

三、彥琮之學行

第六章 佛教在隋代政治、經濟、社會上的作用與影響

第一節 佛教與隋代之政治、經濟

一、安撫人心

二、安置前朝皇室的後宮嬪妃

三、政治叛亂中對佛教的利用與佛教徒之參與政治革命

四、佛教與隋代之國家經濟

第二節 佛教與隋代社會

一、對社會民衆之精神生活的影响

二、佛教徒的社會慈善事業

三、從唐高祖的沙汰佛教詔，看佛教對隋代社會的不良影響

第七章 隋代佛教的文化成就、宗教精神及其與外國佛教的關係

第一節 隋代佛教在文化上的成就	243
一、翻譯	244
二、藝術	244
三、石窟與石經	246
第二節 隋代僧人所顯現的宗教精神	251
一、殉教精神	254
二、大悲利他之精神	255
三、入世濟世之精神	257
四、不媚權貴、守道自足之精神	261
第三節 隋代佛教與印度、後三韓、日本等國佛教的關係	263
一、隋代佛教與印度佛教	263
二、隋煬帝與外國佛教	263

三、隋代佛教與後三韓佛教 ······

四、隋代佛教與日本佛教 ······

第八章 結論 ······

徵引書目 ······

附錄 · 文煥二帝佛教大事年表 ······

第一章 文、煬兩帝與佛教

第一節 文帝與佛教

一、文帝佛教信仰的背景及弘法原因

在中國佛教史上，隋文帝是個極具信仰熱忱的佛徒。其一生的護佛弘法，除了梁武帝之外，國史上能與分庭抗禮的帝王並不多見。而且文帝的建國，又在北周武帝廢佛之後。由於他的極力提倡，才使佛教從浩劫之後迅速地恢復過來。楊堅其人為何如此好佛，其一生弘法又何以如此不遺餘力，凡此諸事，必有其特殊的背景或緣由。近人陳寅恪先生在其《武曌與佛教》一文中即曾論及楊隋皇室的佛教信仰背景。他說：

「……可注意者二事，一爲隋高祖父母之佛教信仰；一爲隋高祖本身幼時之佛教環境。夫楊氏爲北周勳戚，當北朝之時，而智仙潛慝其家。則楊氏一門之爲佛教堅實信徒，不隨時主之好惡而轉，於此益可以證明也。」^①

寅恪先生所言甚是。茲就其所提示，將文帝的信仰背景及原因，作較深入的解釋。

楊堅出生於佛教家庭，而且長養於佛寺之中。因此，自幼即已奠定堅固的信仰基礎。其父楊忠即曾營建佛寺。《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廿六〈栖嚴道場舍利塔碑〉^②：

「栖嚴道場者，魏永熙之季，大隋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立。」

楊堅誕生於佛寺之中，幼時與佛教即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隋、王劭撰文帝之起居注，敘述其事頗詳：

「（文）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同州般若尼寺。……有神尼者，名曰智仙……及帝誕日，無因而至。……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太祖乃割宅爲寺，以兒委尼。……及年七歲，（尼）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③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也載此事：

「皇妣呂氏……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

此外，隋煬帝時，李德林作《天命論》^④也曾敘述其事。而唐僧著述中，提及文帝之出生故事的尤其常見。如《續高僧傳》卷廿六《道密傳》、法琳《辯正論》卷三、神清《北山錄》卷十等都曾言及。可見這件事是隋唐二代頗為流行的傳說。

從上引史料中，可知文帝確是出生在具有濃厚佛教氣息的家庭。其父曾建栖嚴寺，且將撫育楊堅的職責交給一位並不熟識的女尼，這正是典型的佛徒行徑。而楊堅自幼所受佛法的薰陶，後人也不難想見。前引文中「（尼）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等語，對於幼時楊堅的影響自必不淺。其「以弘護佛法為己任」的思想，在幼時當已孕育於腦海之中。家庭信仰與兒時的薰陶乃使楊堅的佛教信仰牢不可破。因此，在其長大為官時，雖然遭逢周武建德年間的兩次法難，其信佛熱忱都能不隨時主之好惡而轉易。這自然不能不視之為家庭信仰背景與幼時佛教環境的影響。

除此之外，文帝本身也具有一般宗教徒所常有的性格。即對鬼神等超自然事物有敬信之心。這種宗教性格與其他信仰因素，往往會互相影響，互相助長，以促使一個宗教人格的形成。《隋書》卷廿四《食貨志》：